

时间进程中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及其选择性变迁

姬超¹ 颜玮^{1,2}

(1.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 518060;2. 闽江学院经济系,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 制度变迁构成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时间进程和空间维度的角度考察多重制度的均衡过程,将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区别对待,从制度的载体——行为及其互动的过程,构建了一个制度丛的三阶段变迁模型。现有制度存量影响资源禀赋和能力及其在人群中的分布,非正式制度塑造行为的同时还可能改变偏好和效用函数,从而突出了行为异质性的特点。制度条件、技术条件和其他行为人的互动协同决定了行为人的行为和策略集合,伴随着这个过程,制度得到加强、削弱、维持或革新。

[关键词] 制度变迁;时间进程;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

[中图分类号] F06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10(2013)02-0028-06

制度和制度变迁构成了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主要内容,制度先后经历了由被忽略到作为与资本、劳动、土地并列的要素。除了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制度对交换和分配的影响及其结果进一步影响生产,即制度的分配效应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但在制度变迁的认识上存在以下主要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制度作为演化秩序逐渐生成是个体所不能把握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制度变迁是基于相对价格的变化引起的制度需求和供给发生变化而导致的。本文认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互相嵌入是引起分歧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导致了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与经济绩效相关性的检验出现互相矛盾的一面。事实上,作为体现社会因素的非正式和正式制度对经济组织和绩效的作用机制并不完全一致。考察这个过程需要将其放在时间进程上,这也是从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多位一体的系统角度看待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点的论证。

一、制度的引入

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制度和时间的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倾向在对经济学的形式化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时也至少造成了以

下后果:首先是忽略了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行为人的异质性,将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以代表性厂商和典型消费者贯之,其行为限定于无摩擦世界基于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既定价格下产量或消费数量选择。尽管在表面上基于个体自利的分析符合西方经济学个人分析法的特征,但先验的将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分不仅与事实不符,在实质和内涵上对行为异质性的简化处理与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内核也发生根本性的背离;其次,对时间的忽略致使分析重点集中于资源的优化配置,造成了对经济长期发展认识的偏差,并将导致经济发展的因素归为外生变量^①。由于以上原因,经济学和现实逐渐脱节,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大为减弱,并因此而饱受诟病。

这一局面自科斯(R. H. Coase)的《企业的本质》(1937)和《社会成本问题》(1960)发表之后开始改观,经过一批学者如诺斯(D. C. North)、威廉姆森(O. E. Williamson)、阿尔钦(A. A. Alchian)、德姆赛茨(H. Demsetz)、巴泽尔(Y. Barzel)、张五常(Steven N. Cheung)、平乔维奇(Svetozar Pejovich)等人的努力,交易费用逐渐被纳入到分析框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得到极大强调,制度是重要的这一点

[作者简介]姬超(1987-),男,河南新乡人,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组织和制度。

似乎已成为常识。围绕这一主题发展出了不同方向的理论分支,如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团队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等。随着对现实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回归,近年来应用层次制度分析逐渐向企业和组织范畴渗透,社会学也已开始出现制度分析的思路,如涂尔干(Durkheim)、普特曼(Louis Putterman)、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格兰诺维特(M. Granovetter)、迪玛奇奥(Paul DiMaggio)、迈耶(John Meyer)、伯恩斯(Tom R. Burns)等人都与经济学开展了有益的对话,形成经济社会学这门新兴学科。相邻学科和交叉领域的互相融合极大地推动了对制度的认识,但在提供富有洞察力的见解同时,对交易成本和制度的滥用也成为混乱的根源,这就有必要在时间进程上重新审视和梳理制度及其变迁。

鉴于制度分析这一范畴的广泛性和宏大性,本文将集中于制度变迁这一突破点,并尝试真正将时间进程纳入到分析框架,这就使本文不可避免地烙上历史主义的印记。此外,在对制度的处理上,本文将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区别对待,以更细致地观察制度的变迁细节,也重新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制度分析的发展脉络

(一)制度的起源和分类

对制度的分析首先涉及制度的起源和定义,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根据研究目的又呈现多样性状态。一般认为制度起源于人类交往及其交往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加上人类自身理性的有限和逐利本性,这就限制了双方交往范围的扩大,从而产生了对制度的需求。制度通过施加惩罚或奖励限制了参与者的任意行为,形成合意的秩序,使得参与者的行为可以预期,也就使得成本收益比较成为可能。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参与者并不总是对所有行为和策略都进行成本—收益比较,各种原因使得这种比较代价过高或不划算而取消,因而只是本能地遵循惯例和已有规则,这样现有制度得到维持和强化。

对制度的定义由于制度形态的多样性使得精确定义几乎不可能。首先,区分制度的不同种类则有助于对问题的分析。从层次上制度大致可以分为:(1)宪制秩序;(2)制度安排;(3)文化禀赋。^[1]最上层的宪制秩序作为基本规则或母规则制约着具体的

制度安排及其运行,文化禀赋包括日常的经验规则和人们的思维模式,其变迁往往呈现滞后和迟缓的特点。从形态上制度又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宪法、产权制度、法律和契约等)和非正式制度(规范、习俗和文化等),强制性和自发性分别构成了两种制度形态的典型特征。相应地,在制度变迁上前者一般对应强制性变迁,后者通常以诱致性和自发的方式发生变迁。此外,诺斯还特别强调了二者的执行机制作为制度中的一种。也有学者使用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对制度进行分类,与前者差别不大。从内容上还可以将制度进一步划分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类型。

正是由于制度的多样性特点,对制度起源的不同认识以及研究目的的需要,对制度的定义也呈现多样化,目前已得到公认的三种制度观就具有极为不同的差别。第一种制度观认为组织即制度,如各种行业协会、学校、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组织;第二种制度观将制度等同于规则,具体而言指的是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该规则定义和限制个人的决策集合,也就决定了交易的形式和激励的内容;第三种制度观在应用进化博弈论和重复博弈论中将制度看作博弈均衡,此时制度具有自我实施和适应性的特征,强调制度的内生性^[2]。此外,也有将人们的交往看作博弈过程,在这一研究方法中,制度要么被看作是均衡(Schotter, 1981; Greif, 1993; Calvert, 1995),要么被看作是促成均衡实现的共同信念(Greif, 1994; Aoki, 2001),要么被看作是博弈规则(North, 1990)。^[3]

可见,制度是具有核心内涵和丰富外延的一个概念,其内涵体现在激励功能,因此形成对他人的行为预期和可预见的行为,降低不确定性,达到交易的目的。其外延则表现为不断扩展或收缩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又是与其他技术性条件,包括资源禀赋、偏好和技术等协同变化的。本文着眼于时间进程上的制度,因此本文首先强调制度的动态性。同时,制度变迁又是一个自我维持、自我增强或削弱的内生变量,相似地,青木(Aoki)将制度定义为关于共享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

(二)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关系

将制度进一步细分为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是深入系统地分析制度的前提^②。另外,从这个角度

入手是由于非正式制度更多地体现为社会和文化范畴,这与单纯就经济而论经济的视角是不同的,更多地从政治—社会—经济一体化、协同的系统角度构建制度分析框架也是本文的现实立意所在。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主要区别在于实施方式,前者一般有专门组织主动制订、强制实施和监督,后者一般经由人们的互动选择、长期演化和自愿遵守而实施。前者包括政治和经济规则、法律、法令、规章、政策、条文等内容,后者包括惯例、习俗、传统、文化、声誉、观念、信任、礼仪、价值认同、道德规范等。

关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关系的文献最常见的是关注两者之间的互补性,即强调正式制度一般应契合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必须建立在本土资源和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之上,否则正式制度极有可能遭遇实施成本过高从而停留在政策目标层面,不能融入到具体生活中去的制度也将面临失效的结局。^[4]与此相反,也有许多学者认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替代性,这种观点的逻辑在于对制度成本的节约。例如,在建构或实施正式制度时如果代价过高,此时非正式制度就得以强化,成为交往和博弈过程的规则,使交易有序进行。进一步,由于正式制度较非正式制度通常具有更强的约束力,而非正式制度较正式制度往往又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现实中制度的发挥作用绝非转瞬即逝,需要长时间的适应和修正。制度绩效就由约束力和灵活性两方面共同决定,制度的约束力和灵活性面临的两难取舍构成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替代结果,这使得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者的取舍进行形式化处理成为可能。^[5]

(三)制度与经济绩效

如前文所言,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成为公认的事实,但长久以来得到强调的却仅限正式制度,这与非正式制度难以处理的特点有关。非正式制度的自发性、演化性和长期性使人们在其面前束手无策,将关注重点转向正式制度也就成为发展冲动的自然选择。但在此逻辑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要复制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型制度理应获得相同的经济绩效和增长,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这一点最鲜明的体现在东欧和拉美国家^[6]。起初人们将

原因归为没有考虑当地非正式制度,因而试图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修正正式制度以取得适应性,但却收效甚微。社会学家因此不无讽刺地描述:社会学家眼里只有约束没有选择,而经济学家眼里只有选择没有约束^[7]。这句话暗指经济学忽略了人们为社会环境和社会观念制约,只寻求选择自认为正确的行为,结果却常常像哈耶克所说的那样:“在我们竭尽全力依据崇高的理想缔造未来时,却发现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了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截然相反的结果”^[8]。与此同时,尽管社会学也忽视了人们的能动性,但社会学却特别强调非正式制度对经济绩效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概念——“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非正式制度虽然不完全等同,却是非正式制度的重要变体。

在与社会学等学科积极对话和交流融合后,经济学领域逐渐认识到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并将非正式制度列为较正式制度更具根本性的因素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王廷惠认为非正式制度是历史积淀与文化演进的结果,是正式制度形成的前提,正式制度则是外显的、嵌入非正式制度当中的^[9]。诺斯也认为正式制度即使在发达的西方世界也只是影响人们选择的约束总体中的极小一部分,非正式制度却是无处不在,正式制度仅在非正式制度不存在的领域或者嵌入到非正式制度中才得以发挥作用^[10]。相似地,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认为新教伦理孕育了资本主义精神并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威廉姆森(Claudia R. Williamson)在实证数据上对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进行了检验,按照制度强度将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分别分为强、弱两种类型,构成四组制度组合类型:(1)强的非正式制度,弱的正式制度;(2)强的非正式制度,强的正式制度;(3)弱的非正式制度,弱的正式制度;(4)弱的非正式制度,强的正式制度。威廉姆森将45个国家按照一定标准依次划分到四个组别,结果显示四组国家的人均GDP依次为28659、23452、5556、2424美元,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有力地支持了非正式制度作为经济发展关键性变量这一论点^[11]。Grief在对比11—12世纪意大利热那亚人和北非地中海沿岸的马格里布人的基础上,也得出文化差别导致了两类人

群日后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3];Barro 和 McCleary 通过对大量面板数据的分析证实了宗教文化和经济发展间的正相关关系。^[12]

然而,对非正式制度主导经济绩效和社会发展的过分强调似乎已逐渐演变为“文化决定论”,事实上许多国家都在实例上对“文化决定论”进行了证伪,统计上得到的相关性并不能成为事实上的因果关联。例如,Acemoglu,Johnson 和 Robinson(2001)通过控制经济制度的其他效应,从经济计量的角度证伪了文化说。^[13]

(四)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在关注了制度的产生、制度间的关系和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基础上,逻辑上的顺序自然转换为制度的延续和变迁。正式制度的变迁以强制性、自上而下性和短期性为特征,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则以自发性、自下而上性和长期演化性为特征。在具体的变迁路径上则存在结构主义和能动主义两种思路,也有学者用演化论和建构论区分不同的变迁路径。^[14] 本文认为,这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可通约的。具体的,结构主义强调制度的系统性和互补性,制度的变迁不取决于单个行为人的意志和行为,而是通过行为人的互动和行为的相互作用决定的,制度变迁表现为演化的特点。相反,能动主义认为行为人基于理性计算可以有意识地 and 任意地建构制度,更加突出人的能动作用。这种差异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制度变迁认识的分歧,在时间进程上考察制度变迁调和了这种矛盾,将时间纳入分析框架,过去的制度存量和结构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现在和将来的制度变迁路径,也影响着行为人的认知和判断。结合现时的技术和资源条件,通过具有历史认知的行为人或组织这一载体,制度变迁便同时具备了结构性和能动性的特质。

三、时间进程上的制度变迁

(一)制度变迁的主体

本文认为,对制度的理解必须要在其载体的意义上,否则就失去了真实性。这种载体即是行为主体,包括单个的行为人和组织。制度起源于人们的交往愿望并由行为人创建、推动和革新,行为人互动的结果产生了制度的初始形态,在重复性互动中这种制度形态逐渐得到加强、削弱或修正。反过来,成型的制度又会对

行为施加影响,通过认知的形成、对环境的判断、对别人行为的预测、对收益—成本的计算以及对失误的修正不断将行为人塑造为制度人、社会人。

(二)多重制度均衡

由于环境和交往的复杂性,人们通常要与环境进行主动的、反复的交互作用,行为人面临的不只是单个效用函数和单个制度约束。制度通常以制度丛的形式存在,共同影响行为人的选择。在时间进程上对制度的理解不仅限于制度的连续变迁,还包括空间上的多样性和互补性,因此制度的变迁是制度丛协同演化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行为约束不仅限于制度,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和个人能力等技术约束同样制约着行为。此外,不同制度约束行为的强度和形式也有所不同,如正式制度更多地倾向影响行为人的成本—收益情况,非正式制度则可以通过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方式塑造行为人的效用函数,也影响人们的认知方式和程度,进而影响人们的选择。最终的均衡是制度丛形成稳定的结构,塑造了不同能力和层次的行为人,促进了社会交往秩序的形成。

(三)制度的选择性变迁

在界定了制度变迁的主体和多重制度均衡之后,本部分着重关注制度变迁的过程和细节:为什么有的制度不断得到强化和巩固,有的制度则逐渐减弱?行为主体在制度的选择上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图 1 表示了一个三阶段的制度变化模型。

图 1 左端的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表示现存的制度存量,将非正式和正式制度区分表示制度是作为一个体系存在的,而且一般认为非正式制度的出现要早于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这是图 1 中将非正式制度列在前面的原因。其中的 1、2、3 表示三种类别的制度,代表制度丛。之后的箭头簇表示制度对行为人产生作用的过程,L1 这条障碍线表示该过程是有成本的,从制度的角度看这种成本即为实施成本,从行为人的角度看则是认知成本,不同行为人对制度的认知程度甚至认知内容都是有差别的,图 1 中平行的较粗的箭头表示制度的影响较大,交叉的较细的箭头表示制度的影响较小,这一点体现了行为人的异质性。除了对行为的限制,制度还影响资源禀赋、个人能力,以及其这种技术性条件在行为人中间的分布。

本文认为,制度通过对资源和机会的分配塑造了一定的社会结构,赋予行为人不同的角色和能力,构成了社会多样性的特征。之后,制度存量和技术存量(资源禀赋、个人能力等)共同构成行为人的收益—成本条件,也即决定了行为人的策略集合和行为选择。面临众多的策略集合,最佳的行为选择取决于他人的行为,对他人行为的预测有待行为人的理性计算,当然这种理性是有限度的。这里用 $F_{k,t}$ 表示行为人的效用函数,其中 k 为正整数,代表行为人, t 代表时间。 $R_{k,t}(x_{i,j}, y_{i,j,m}, z_{j,m})$ 表示行为人净收益最大化的函数,该函数是各行为人对制度所采取的态度互动函数,其中 $x_{i,j}$ 表示行为人 1 ($k=1$) 对制度 1 和制度 2 所采取的态度, $y_{i,j,m}$ 表示行为人 2 ($k=2$) 对制度 1、2、3 分别采取的态度, $z_{j,m}$ 表示行为人 3 对制度 2、3 所采取的态度,这种态度包括遵守和背叛两种。用 $C_{k,i}$ 、 $C_{k,j}$ 、 $C_{k,m}$ 分别表示制度 i 、 j 、 m 对行为

人 k 的实施和认知成本。显然, $F_{k,t} = R_{k,t} - C_k$ 。以上分析论述了制度条件、技术条件和行为人之间的互动共同决定行为的作用机制,但与此同时,非正式制度还可以通过改变或塑造行为人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偏好,从而改变行为人的效用函数。假如效用函数没有发生改变,那么初始制度在下一轮交往和互动中 will 得到加强,假如效用函数发生改变,行为人就将主动做出改变,协商创立新的规则或修正现存制度,新的规则作为准制度的形式存在,在重复互动中不断得到加强或削弱,最终演变为稳定的制度,这正是图 1 下半部分表示的内容,整个过程循环往复,技术性条件、行为策略和制度都得到更新和变迁。中间由于各种不确定性以及行为人的有限理性,该过程可能产生意外的误差项,带来意外的成本或收益 \S , $F_{k,t} = R_{k,t} - C_k + \S$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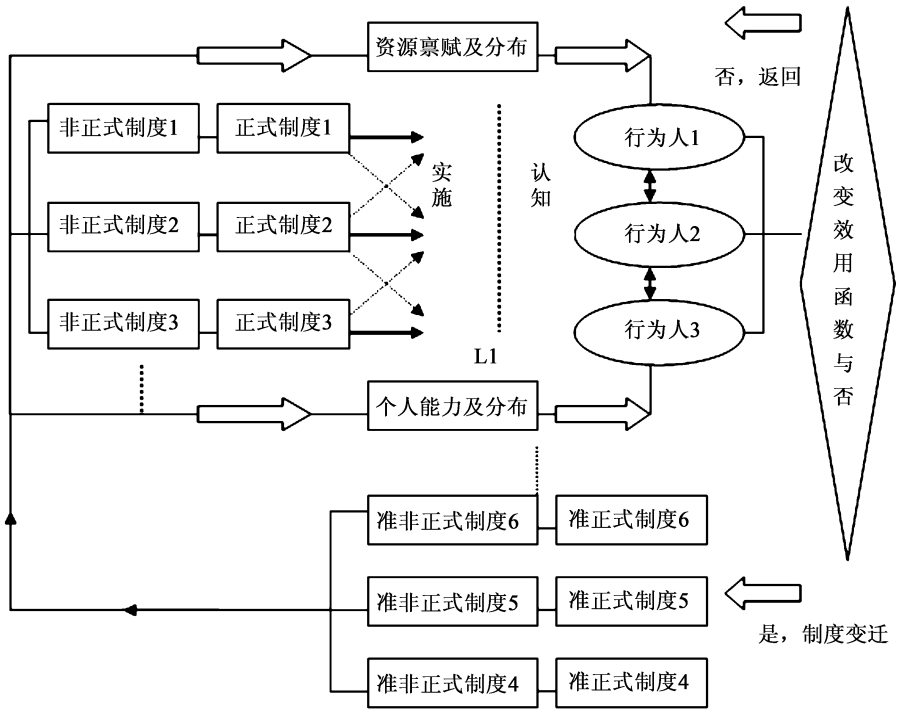


图 1 制度选择性变化的三阶段简化模型

综上,制度变迁的第一个阶段是,特定的制度体系是否改变了行为人的效用函数,如果改变,那么效用函数将由初始的 $F_{k,t}$ 变为 $G_{k,t}$ 。如果 $F_{k,t} \geq G_{k,t}$,初始制度得到加强;如果 $F_{k,t} \leq G_{k,t}$,行为将主动推动制度的革新;如果等号严格成立,本阶段的制度变迁将呈随机状态。第二个阶段涉及制度在长时期下的变迁,短期内某种制度得到加强并不能保证该制

度的稳定,行为人在对制度的选择上通常会根据以往经验对制度的长期效用形成认知。假设时间贴现因子为 r ,如果 $\sum_{t=1}^{\infty} F_{k,t}/(1+r_k)^t \geq \sum_{t=1}^{\infty} G_{k,t}/(1+r_k)^t$,初始制度得到加强,作为更具适应性的制度稳定下来;如果 $\sum_{t=1}^{\infty} F_{k,t}/(1+r_k)^t \leq \sum_{t=1}^{\infty} G_{k,t}/(1+r_k)^t$,初始制度得到削弱,新的制度作为更具适应性的制度得以稳定;

如果上式中的等号严格成立,则哪种制度更具适应性由随机因素决定。

制度变迁的第三个阶段涉及现有技术性条件的变化,诸如资源禀赋在行为人中间的分布,行为人能力的提高。这些变化扩大了行为人的行动和策略集合,使得更多的制度得到传播、修正和试验,在图中表现为制度1向行为人3的传播,制度3向行为人1的传播。多重制度的试验为交往的扩大提供了机会,为扩大获利性提供了机会,交往规模的扩大使市场规模扩大,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深,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以上过程以自由、能容忍失败和鼓励创新的环境为前提,否则整个经济和社会环境将处于一个低水平的循环状态。

四、结论

制度的变迁是在时间进程上的真实过程,基于成本—收益的比较,特定的行为主体推动了这一过程。影响成本—收益的包括制度约束、技术约束及其他行为主体的互动,现有制度存量不但影响资源在行为主体间的分布,非正式制度还在规范和意识形态上塑造着行为主体的效用函数。这提示了在设计、构造或者引导制度变迁时,不能单就一项制度入手。一个制度也许给行为人制造了负的收益,但引进新制度的成本与其带来的收益之差可能尚不足弥补制度的净损失,反之类似。因此,对制度的综合比较不仅包括哪种制度的净收益更大,还包括哪种制度的净损失更小。在机会成本的思路下,有必要全方位的、基于过程的比较分析,审慎地对待制度革新。

更接近现实的分析似乎与可处理性存在永恒的矛盾。为了更贴近实际地认识制度变迁,基于过程的制度变迁在形式化处理上仍然面临许多困难,这一研究也需要更多实证资料的积累来检验和修正,这亟待制度变迁领域的进一步研究。

【注】

①尽管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也发展出内生增长理论,将资本和技术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但在根本上,物质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投资及技术创新都是由行为人这一主体所主导,其动力机制在此类模型并未指出,致使模型的逻辑不够彻底。换种说法,这些因素只是增长本身,而不能作为增长的原因,见 North, Thomas(1973)。

②也有学者不赞成分别看待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认为两者互相嵌入,协同发挥作用,单个来看是没有意义的,详见周业安(2001)。但大部分学者还是赞成这种区分的,分析二者的协调关系和相互作用对于分析制度变迁仍然是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美]克里斯托夫·克拉格. 制度与经济发展:欠发达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增长与治理[M]. 余劲松等.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1.
- [2][日]青木昌彦. 什么是制度? 我们如何理解制度?[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06):28-38.
- [3][美]阿夫纳·格雷夫. 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的兴起[M]. 郑江淮等.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7.
- [4]魏建国. 法治现代化不可忽视的环节:非正式制度与本土资源——以普遍信任为视角[J]. 学术论坛,2010,(05):131-135.
- [5]唐绍欣. 传统、习俗与非正式制度安排[J]. 江苏社会科学,2003,(05):46-50.
- [6]Carl F. Fey, Daniel R. Deniso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Effectiveness: Can American Theory Be Applied in Russia? [J]. Organization Science,2003,(06):686-706.
- [7]周雪光. 制度是如何思维的[J]. 读书,2001,(04):10-18.
- [8][奥]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 通向奴役之路[M]. 滕维藻等.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11.
- [9]王廷惠. 非正式制度、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J]. 开放时代,2002,(03):82-94.
- [10][美]道格拉斯·C·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刘守英. 上海:三联书店,1994:49.
- [11]Claudia R. Williamson. Informal Institutions Rul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J]. Public Choice,2009,(139):371-387.
- [12]Barro, R. J., R. Mc Cleary. Religion and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2003, No. W9682.
- [13]Acemoglu, D., Johnson, S., & Robinson, J.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5):1369-1401.
- [14]黄少安. 制度经济学中六个基本理论问题新解[J]. 学术月刊,2007,(01):79-83.

(责任编辑:宋 敏)